

今年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江流诞辰 100 周年。江流出生于 1922 年，山东栖霞人，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洗礼。1951 年进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4 年留校任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园地辛勤耕耘了 60 年。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教育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等。

江流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研究和宣传工作，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理论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着全面、贯通、系统的把握。他坚持和弘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注重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要理论观点，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研究课题，取得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培养了一大批理论人才，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界一代领军人物。

创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

江流是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在我国，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事情。1980 年 12 月 10 日，江流在全国党校系统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课程建设问题》的主旨发言，总结了中央党校五期高中级轮训班的教学实践，说明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对于拨乱反正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加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回答社会主义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要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再教育，重新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了适应党校教学的需要，他提出要着手编写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他认为这不仅对今后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工作有重大意义，就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学科的发展，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他提出，我们要编写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应该是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教科书，这就要求我们理论工作者花费心血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他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重大课题。他强调，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建立和建设好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崭新的学科，必须有好



□ 王怀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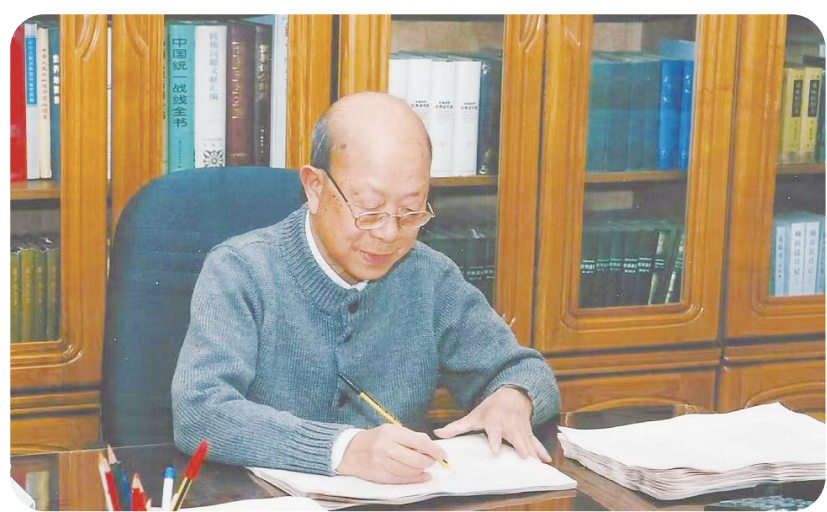
即读书之风、思考问题之风、调查研究之风，同人家平等商量问题的风气。他和范若愚等共同努力，联合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界有研究的学者共同编写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一书，并于 1983 年出版，这本著作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着重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很快就成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重要教科书，可称之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此后，江流主编的《简明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系列丛书》等著作，为普及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3 年，江流参与筹备成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担任副会长，1985 年至 2000 年，担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此后长期担任名誉会长，长期主持和指导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工作，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学术年会，从未间断过，在历届学术年会上，他都亲自主持主旨发言，这些主旨发言紧扣时代主题和学术界研究重点，对于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起着引领作用。

江流还十分重视教研队伍建设。他认为，人才建设是学科建设之本。为了培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才，他力促中央党校招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学位研究生，并作为中央党校首批硕士生导师和首批博士生导师，分别于 1981 年和 1986 年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此后的 30 多年间，江流亲自指导了 20 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他们多数成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界的学术骨干，有的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

江流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开拓，对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队伍建设倾注了极大心血，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社



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命题。在那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江流于 1979 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理论文章（随后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怎样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道路。江流认为，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认识清楚了，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没有被我们认识的必然王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去研究、去探讨、去认识。他强调，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根据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来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他认为，实践最有发言权。无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不倾听实践的声音，不接受实践的检验，一切都按照马克思列宁的只言片语来谈论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他强调要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来检验和修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近 20 年后，他又发表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显著特征，体现为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成果，即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实践。社会

主义在实践中发展是运用科学理论思维的结果。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内涵和要求是理论要结合本国实际、理论要紧密联系路线方针政策、理论要在实践中应用和发展。

二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是全面的”这一理论命题。1989 年 7 月，在吉林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四十年理论研讨会”上，江流提交了一篇论文《社会主义是全面的》。文章后发表在《新长征》上。文章结合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从三个方面得出“社会主义是全面的”这一命题。第一，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真理是全面的，他不是片面的、狭隘的学说。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是全面发展的社会，跟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三，要建设全面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全面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性，江流在自选集中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越来越显示出社会主义的这个内在属性。党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新的建设指导方针的制定也越来越体现出社会主义的这个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新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因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

三是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是发展的”这一理论命题。在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撰写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的 10 年后，江流在《科学社会主义》2008 年第 6 期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和新发

展——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文。文章回顾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不发达阶段到发达阶段的发展，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十个结合”是科学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国情的新经验和党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2016 年，江流因病住院后，还抱病撰写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篇章》一文，并在《学习时报》上发表。他在文章中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课题，解决了就能够把人类再向前推进一步。他认为当今中国的时代课题是社会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就在于我们党抓住了发展这一时代课题。这一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我们党把发展置于科学的轨道上，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40 多年的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四是系统论述了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关系。1985 年 7 月，在全国党校科学社会主义年会上，江流作了题为《改革与社会主义》的主旨发言。该发言稿刊登在《理论动态》第 616 期上，发表于《红旗》1986 年第 14 期。文章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生气勃勃的活力所在。离开了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改革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日益完善、日益成熟和日新月异的发展。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揭示了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前进，改革一定要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变革的适当形式。这是国内学者关于改革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较早论述。该文科学地回答了“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时代命题，对于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防止“苏东剧变”在中国的发生起到了警示意义。

江流的学术思想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正

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也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涵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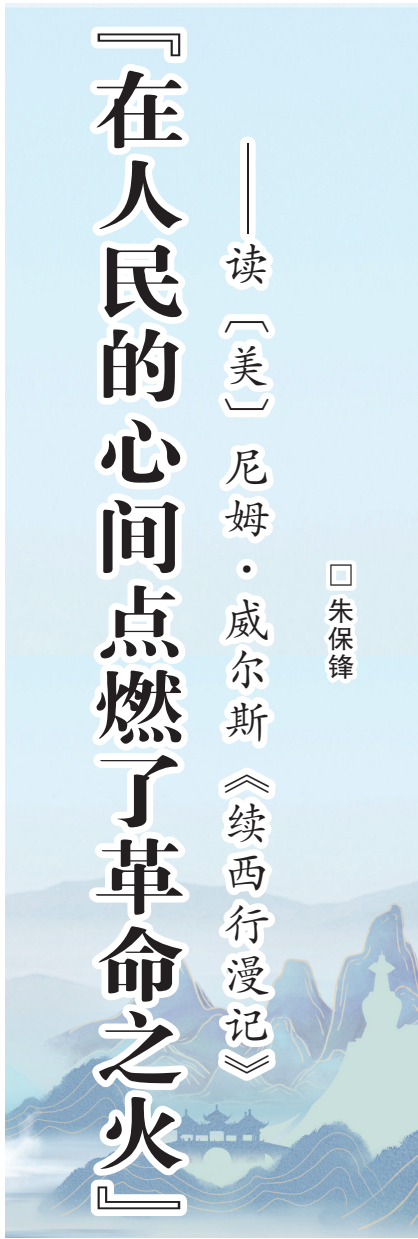
江流才、学、识兼具，他之所以能取得非凡的学术成就、成为学高德重的学科泰斗，与他拥有优秀的品质和优良的学风也是分不开的。

治学严谨，知行合一。江流有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有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把这种坚定的信仰和信念融入自己的学习、研究、教学工作之中。他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当作一种追求、一种责任、一项事业、一种崇高，观点鲜明，知行合一，自始至终不唯上、不唯书、不跟风，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独立思考，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奋力前行。

尊重实践，勇于创新。江流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江流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发扬的学风。他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把握，特别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真正做到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大胆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无论是写作《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一文，还是提出“社会主义是全面的”这一命题，都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特点。

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要尊重科学，服从真理。而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就应当把党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统一起来。在这方面，江流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认为，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阐发，还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都不能离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质的理解、运用与发展。以科学的、严谨的、认真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江流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著作和文章更是充分体现了党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高度统一。

为人正派，思想深刻。江流为人耿直、一身正气，品德高尚、意志坚定，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爱青年、诲人不倦。他治学严谨，思维缜密，尊重实践，勇于创新，善于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呈现出大家风范、大师格局。



尼姆·威尔斯，原名海伦·福斯特，是 20 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她于 1907 年出生在美国犹他州，1931 年 8 月来到中国并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1937 年 4 月，尼姆·威尔斯克服重重困难，经西安、云阳顺利抵达延安。在延安停留的近 5 个月时间里，她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记了 27 本笔记，拍摄了 300 余张照片，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素材。后来，尼姆·威尔斯把她的采访见闻和个人感受撰写成了《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又名《红色中国内幕》），进一步向世界揭开了陕甘宁边区的“神秘面纱”。正如她在书中前言所写道，“这是一次发现新事物的旅程——发现了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

“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型部队”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国民党反动

政府的封锁和阻挠，很少有记者能够进入到苏区进行采访，外界对于共产党和红军印象多来源于歪曲报道，甚至有些纯粹是污蔑造谣，尼姆·威尔斯之前印象中的红军形象就来自这些报道。在帮助斯诺整理写作资料的过程中，她才了解到，原来红军是一支充满信仰、坚贞不拔和英勇顽强的革命队伍。这种反差，是促使她决心开启这次“发现新事物旅程”的重要原因。

尼姆·威尔斯第一站首先到达了渭河北岸的云阳镇，这里也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在近距离接触红军的过程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红军队伍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年轻和勇于牺牲。对于年轻的红军战士在艰苦条件下所展现出来的自尊和自信，尼姆·威尔斯惊叹不已：“他们年轻，人人都有高度的自豪和自尊感，我不由得暗暗惊叹。他们褪了色的制服，尽管补了又补，却很整洁，而他们那副充满自信的神情，是用笔墨难以形容的。”在她看来，在长期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的旧中国能够出现这么一支“精力充沛，勇于牺牲，富于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是不可思议的。之所以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这样的奇迹，她认为关键在于红军是一支富有理想和革命觉悟的队伍。“只有理想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把原材料塑造成型”，特别是经过长征的“熔炉”淬炼，“改变了红军的特点，使它从土地革命的战士和保卫者变成新革命阶段有觉悟的先锋战士”，将红军锻造成了“优质钢铁成的革命精华”。尼姆·威尔斯确定地认为，红军是

“最能适应环境的生存者，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人类最佳标本”，这支队伍在“为造就革命者而奋斗，为清除旧中国的腐败、殖民主义和一切积弊而战斗”。

“摘下心爱的红星，身穿国民党军服去迎战日本人”

1937 年 5 月，尼姆·威尔斯抵达延安。此时，国共两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仍在进行中，这也自然成为她采访中关注的重点。在延安，尼姆·威尔斯见到了周恩来，并就国共谈判相关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针对尼姆·威尔斯的问题，周恩来坦诚作答，明确告诉她中国共产党“是为民主而斗争”的，现阶段的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现在为了抗日自卫，我们要在除汉奸以外的中国各阶级的人民中，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民主运动”。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希望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期实现民主自由、民族解放和社会福利”。此次采访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由原来的对立、停战逐渐走向携手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书中，尼姆·威尔斯列举了纲领的内容，并且记述了毛泽东向她阐述纲领内容的情形。尤其令她印象深刻的

是，毛泽东这位“头脑冷静、深谋远虑、能正确判断形势的出类拔萃的政治领袖”在阐述纲领时不无慷慨地讲道：“这是我们伟大的抗日纲领。我们已经提请南京政府接受。如果我们能实现十大纲领，就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然的话，中国要亡国。”也是在 8 月 25 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这期间，尼姆·威尔斯目睹了红军战士在更换番号军服时的不舍与留恋。有一次，她在屋中偶然透过纸窗的小孔看见保卫局派来的警卫员正在拨弄新配发的国民党军帽，他“擦拭着琅琅质的资产阶级蓝白色帽徽”。联想到这个警卫员从江西长征出发时就一直戴着一顶缀有红星的军帽，后来红星破旧得无法辨认时，还曾爱惜地将其亲手缝补一新。尼姆·威尔斯在书中充满深情地写道：“他一定是在怀念那颗破旧的布红星。”虽然充满了不舍和留恋，但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英勇的红军战士“摘下心爱的红星，身穿国民党军服去迎战日本人”，义无反顾地开赴了前线。

“与人民融为一体”

在书中，尼姆·威尔斯这样描述道：中国共产党人“如同巨人安泰，每当被对手紧紧压倒在地时，大地就赋予他更大的神力，因为他们与人民融为一体”。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只要他的身体不离开土地，就

能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战胜它。尼姆·威尔斯发现，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直至全面抗战爆发，虽然中国共产党屡遭挫折甚至曾面临被反动势力“赶尽杀绝”的危险境地，但是总能“在关键时刻自生自现”，“你越是把他打翻在地，他就越发力大无穷”。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政党始终与人民融为一体。

尼姆·威尔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之所以能够与人民融为一体，除了群众“信赖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办的事对他们都有利”外，还在于这个党和军队有着不同于其他党派和军队的特点。1937 年 9 月，她在洛川接触到了贺龙率领的部队。在随军行进的过程中，部队的优良作风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发现，部队行军时“每借一物，必定付钱，甚至借用一口锅，只用几分钟，也要付几枚铜钱”。在农家投宿时，“晚上，尽管战士都已经疲倦不堪，也仍然一丝不苟执行军纪，把院落和住处打扫干净”，即使在人烟稀少的山谷中经过瓜田或梨园，“红军战士却从不看一眼”。这种情况令尼姆·威尔斯感到不可思议：“搞共产主义的人竟如此尊重私有财产，令人不胜惊讶。”但同时也解开了她的一个巨大疑惑：“正因为有这种美德，无怪这些年来他们为农民所拥护。”在尼姆·威尔斯看来，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并且有着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所以才能与人民融为一体。由此，她也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因有人民支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